

軍事學術講座



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翻印

军事学术讲座

(古代战例)

520123
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翻印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

出版编号:	j 999
出版年月:	1979年12月
出版份数:	0001—2500
校 对:	刘创新 董爱国
封面设计:	张学群 滑兆西

目 录

一、晋楚城濮之战	(1)
第一节 春秋的形势及晋楚争霸中原局势的形成	(1)
第二节 城濮之战,晋楚双方的战略运用	(4)
简 评	(10)
注 释	(11)
二、勾践灭吴战争	(15)
第一节 吴、越矛盾的形成	(15)
第二节 勾践灭吴的战略准备	(16)
第三节 夫差北上争霸	(19)
第四节 勾践灭吴的战争经过	(20)
简 评	(22)
注 释	(23)
三、秦赵长平——邯郸之战	(25)
第一节 战国形势及赵、秦两国的对外战略	(25)
简 评	(29)
注 释	(29)
第二节 秦国在新战略指导下对赵国的长平之战	(31)
简 评	(38)
注 释	(39)
第三节 赵事合纵,坚持抗秦的邯郸之战	(40)
简 评	(44)
注 释	(44)
结 束 语	(45)
四、楚汉战争	(47)
第一节 在秦末农民起义战争中刘、项势力的形成与壮大	(47)
第二节 刘、项争夺封建统治权的初期	(48)
第三节 汉军乘隙进攻期间双方战略的运用	(49)
第四节 汉军转入防御期间双方战略的运用	(50)
第五节 汉军反攻期间双方战略的运用	(57)

第六节 楚汉战争有关胜败的几个问题	(57)
注 释	(59)
五、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	(63)
第一节 战前封建割据的一般形势	(63)
第二节 曹操统一北方的战略	(65)
第三节 击败袁术、张绣、吕布之战	(66)
第四节 击破袁绍的官渡之战	(68)
第五节 曹操统一北方战争中几个问题的研究	(74)
注 释	(77)
六、吴蜀争夺荆州之战	(81)
第一节 战前概述	(81)
第二节 江陵之战	(85)
简 评	(86)
第三节 彝陵之战(猇亭之战)	(89)
简 评	(92)
七、李渊集团统一全国的战争	(95)
第一节 隋末形势和李渊集团的战略方针	(95)
第二节 入据关中	(98)
第三节 巩固和扩大根据地	(100)
第四节 平定中原	(104)
评 述	(107)
注 释	(110)

晋 楚 城 濮 之 战

城濮之战，是春秋时期晋楚长期争霸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争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弱胜强的范例；是高度运用策略斗争以配合军事斗争的典型。研究这一专题的目的在于加深对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体会。其具体目的：

1. 研究晋文公以弱对强，如何运用战略和策略以争取在战争过程中始终处于有理、有利的地位，争取主动和优势；
2. 研究楚成王为维持中原霸权的战略和策略的运用；
3. 研究晋楚两军在城濮决战时，晋军避实击虚的作战指导特点。

第一节 春秋的形势及晋楚争霸中原局势的形成

（一）春秋的形势及军事特点（附图1）

周平王元年（公元前770年），周平王由镐京（今陕西西安西南）东迁洛邑（今河南洛阳），此后史称东周。从东周开始到周元王元年（公元前476年）是我国历史上春秋时代^①。这个时代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代。

周平王东迁以后，西土为秦国所有，秦国吞并了周围一些戎族部落和国家，成为西方强国；在今山西南部的晋国，并灭了一些姬姓国家和北狄部落，成为北方强国；在今山东境内的齐国，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，强大起来，成为东方强国；在今湖北境内的楚国，先后向四周扩展土地，成为南方强国。

在今河南中部的郑国，在中小国家中是比较强盛的。其北是卫，东是曹、宋、鲁，东南有陈、蔡，南有许。这些中小国家，成为当时大国争取和掠夺的对象。

在今河北北部的燕国，这时很少和中原交往。在长江下游南岸，后来兴起了吴、越两国。

周王局处在今河南西部一隅之地，地位一天下降，地盘一天天缩小。

由于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新的不平衡，有的强大起来了，有的衰弱下去了。加以周室衰微，诸侯为了争取领导权。就企图以“尊王”这块招牌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积极发展自己势力，进行一系列的“搂诸侯以伐诸侯”的兼并战争，因而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，战争从此更为频繁。

这种战争的目的，不仅在于夺取政治的领导权，还包含代征天子贡纳和无限制地扩展领土的要求。这种战争带有残酷的掠夺性和侵略性。但就其另一方面来说，它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频繁往来和互相影响，加速了各族人民相互同化和融合的步伐。这对尔后多民族的全国性的统一创造了条件。

由于春秋时期的战争一天比一天频繁，因此在战争的方式上和规模上也有很大的发展。

武器大致是用青铜制造，计有戈、矛、戟、剑、弓矢等。作战以车战为主②。交战双方往往避开运动困难的地形而选择一个在两国“封疆”间的平原地区，把军队排列成整齐的车阵，然后开始交战。两军作战大都是正面冲突，只要阵势一乱，就难以重整旗鼓，胜负就决定了。国境上虽然已开始建立关塞，但平时往往不驻兵防守，利用高城深池则是这个时期的主要防御手段。当时对高城深池的进攻，还没有什么有效的战法。

各国的军事领导骨干主要是诸侯的宗族及私属；国人③在战时被召集入伍，作为从属于宗族和私属的主力部队；同时也还强迫征发所隶属的野人④，作为随从于甲士的徒兵或服劳役。因此，各国军队的人数较少（大国只有三军，约三万多人，车千乘），参战的兵力数目也不大。车战即是作战主要方式，而战车的行动又受到很大限制，因此作战行动范围也较小。一场战争，有的就进行一次会战、在一天最多两天就见分晓，所以战争（会战）的持续时间也很短。

春秋时代是文武不分，将相合一的世卿领兵制度，主将、佐将都由世卿兼任。由于作战没有复杂的机动，指挥艺术也就比较原始。但在列国纷争，互相兼并的情况下，在策略的运用方面——争取与国、孤立敌人的斗争，则是十分尖锐的。

春秋时代，正处在一次社会变革的时期，因此军事上受“礼”所束缚的“正道”思想发生了动摇。“正道”思想认为“兵为征不义，不为苟胜”（要师出有名才能取胜）；要“伐备钟鼓”⑤（侵袭就是不合乎“正道”）；要“成列而鼓”⑥（不能进攻还未布好的敌人）；“不穷不能”⑦（不能乘敌人困难的时候进行攻击）；“逐奔不过百步”⑧（不要穷追逃跑的敌人）等等。但是经过许多战争实践证明，“正道”不但不是致胜的良好战法，反而会遭致丧师亡国的结果。所以自春秋以来，“正道”思想就开始动摇了，虽然也有不少象宋襄公那样还在坚持“正道”的人⑨，但到春秋中期以后，“诡道”已被比较广泛的运用了。到了春秋末期，孙子就明确地总结出“兵者，诡道也”⑩这个非常精辟的论点。

晋楚城濮之战，就是在上述情况下进行的。

（二）晋楚的兴起及争霸中原局势的形成

春秋初期楚武王（熊通）时，楚国就已控制了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，成为土地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南方大国。楚文王（熊资）时，灭掉了申国（今河南南阳）、息国（在今河南息县）、邓国（在今河南邓县），屈服了蔡国，插手郑国事务，向着黄河流域争夺土地。

到楚成王（熊恽）时，齐桓公（小白）称霸中原，阻止了楚国向北扩张。楚国乃转而向东发展，先后灭亡了弦（在今河南潢川西南）、黄（在今河南潢川西），打败了徐国（在今安徽泗县北）。到齐的霸业衰落后，楚成王又凭借其优势的军事实力，转锋向北。

这时，宋国有个宋襄公（兹文）妄图继承齐桓公的霸业。但在周襄王十四年（公元前638年）时，在泓水（今河南柘城附近）被楚军打败了。于是，齐桓公称霸时的盟国鲁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许、曹、卫等，都陆续转为楚的盟国。这样，黄河流域的许多中、小国家，即被楚国所控制。

正当楚国称霸中原的时候，晋国勃兴起来了，成了楚国的劲敌。

晋国是护卫周平王东迁的强国之一，但是，由于长期内乱，使它无暇外顾。到晋献公（诡

诸)时,他剪除了一批和自己对立的公族,任用亲信,巩固内部,灭掉耿、魏、虞、虢等西周封国,又战胜了驪戎,打败了北狄,统一了汾河流域,把势力发展到黄河南岸和西岸。

晋献公死后,他的几个儿子争位,国内大乱。公子夷吾(重耳子弟)得到秦穆公的帮助回国,立为惠公。周襄王七年(公元前645年)秦国和晋国打仗,晋惠公被秦俘虏了。晋国的大臣们假称君命作“鞌田”^⑪,发展了生产,作“州兵”^⑫,增强了军事力量。这些改革,为以后晋国的强盛准备了条件。

周襄王十五年(公元前637年)晋惠公死,其子圉立为怀公。次年正月,公子重耳又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国,杀怀公自立,是为晋文公。他曾在外流亡十九年,周游列国,对当时社会较为了解,也积累了一些政治经验。回国后,又任用赵衰、狐偃、先轸等才能之士,励精图治。在内政方面,采取免除宿债、减轻赋税和徭役,救济贫民以收揽人心;奖励农业,发展商业,节省开支,储备物资以发展经济。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,减轻了人民的负担,推动了生产的发展。

晋文公还很重视对人民“义”、“信”、“礼”的教育^⑬,即教育人民忠于公室,信赖政府,训练军队,整伤军纪。通过这些教育,博得了人民对他的信仰,加强了内部的团结,增强了国家的实力。因而晋文公称霸的野心,也因之越来越大了。

在外交方面,晋惠公时,不但受到秦国的攻击,还遭到北狄的侵略。晋文公回国后,利用与秦国、戎狄的婚姻关系^⑭,利用齐国与楚国的矛盾^⑮,采取了联秦、齐,和戎狄的外交政策。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,造成有利于晋与楚争霸的良好局面。

周襄王十七年(公元前635年),亦晋文公即位后的第二年,周朝王室发生了内乱,周襄王遭到他弟弟叔带勾结狄人的攻击,出奔郑国,向秦、晋等国求救。

赵衰向晋文公建议说:“求霸莫如入王尊周,周晋同姓,晋不先入王,后秦入之,毋以令天下。方今尊王,晋之资也。”^⑯

晋文公采纳了赵衰的建议,遂率领晋军到达阳樊(今河南济源),以右军围攻温邑(今河南温县西南),击败了狄人,杀死了叔带;以左军迎接周襄王回到洛邑。

周襄王很感激晋文公,用隆重的礼节招待他,还赐给南阳——阳樊、温、原、濮茅四邑。通过这次“勤王”,晋文公抓到了“尊王攘夷”这张王牌,在诸侯中间的威望大大提高,增加了争霸中原的政治资本,又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战略基地。

同一年秋天,晋文公又怂恿秦穆公(任好)袭击楚的属国都(今河南淅川西),这是对楚国作试探性的进攻。

晋文公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条件已经成熟了。但是,要想争夺中原的霸权,就非直接与楚国较量不可。楚国实力强大^⑰,而晋国是新兴的国家,力量还很小。所以晋国的战略是连齐、秦,和戎狄,尊奉周室,拉拢与国,待机与楚争霸中原。楚国则是为了巩固和扩大中原的霸权,怂恿鲁国与齐国作战,以削弱齐国,控制卫、曹、郑等国,以杜塞晋国。

宋成公(王臣)曾在泓败服于楚,但并不甘心,现在看到晋文公“出定襄王”以后,威望日增,且过去又曾经善待过晋文公,遂转而投靠晋国。楚国为了巩固中原的霸权,就出兵攻打齐、宋,并借以制止晋国的向南扩张。

晋国也利用这个机会,以救宋为名,和楚国争夺中原的霸权。于是就揭开了城濮之战的序幕。

第二节 城濮之战，晋楚双方的战略

运用(参阅附图2)

(一) 伐卫攻曹，以解宋围

周襄王十八年(公元前634年)冬，楚成王以宋国背楚从晋而出兵伐宋，以子西率师围攻缁邑(今山东金乡)。鲁国也乘机借用楚兵攻齐，夺占了齐地谷邑(今山东东阿)，以楚国的申叔率师戍守，以控制齐国。

第二年冬，楚成王又亲自出马，率领楚国大军及郑、陈、蔡、许四国军队伐宋，围困宋都商丘(今河南商丘)。宋成公急忙派公孙固到晋国求救。

这时，晋文公即位已经三年，国力日强，政治威望已经树立，向外扩张建立霸业的时机逐渐成熟了。因此，大夫先轸极力劝说晋文公立即出兵帮助宋国解围，争夺中原霸权。他认为：“报施①救患，取威定霸，于是乎在矣。”

但是，在那时出兵打仗，没有充分理由，不独国人不同意，且易引起他国的攻击。若是以救宋伐楚为名，又怕说晋国未报楚惠②而向楚进攻。况且宋国又不靠近晋国，远道援宋，在军事上也是不利的。因此，不能不使晋文公有所顾虑。

另一个大夫狐偃也和先轸同样主张出兵，但他认为军事行动应该讲求策略，遂提出一个伐卫攻曹，以解宋围的战略。他说：“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，若伐曹、卫，楚必救之，则齐、宋免矣。”晋文公采纳了这个建议，确定了伐卫攻曹，以解宋围的战略。为了加强军队的力量，首先把晋国原来的上、下两军扩充为上、中、下三军，积极训练，迅速组成了一支阵容整齐、纪律严明的军队。

周襄王二十年(公元前632年)一月，晋文公把军队集中在晋国和卫国的边境上，借口说曹共公(襄)过去曾对晋文公无礼③，而要求卫国假道以伐曹国。卫国与楚、曹两国同盟，当然不许。晋文公采纳先轸的建议，把军队撤回，秘密地从南河(今河南汲县南黄河渡口)渡过黄河，乘卫军不备，突然侵入曹地(今河南滑县境)，迅速向卫国内地进军，攻取五鹿(今河南濮阳)，利用卫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，驱逐了卫成公，晋军遂进入了卫都楚丘(今河南滑县)，二月占领全部卫地。

当晋军进入卫境以后，楚军自宋派遣军队救卫，因晋军进展迅速及卫人已驱逐卫成公，楚军救卫不及，遂退回宋境，继续围攻宋都商丘。

与楚军北上救卫的同时，鲁僖公(申)也派公子买率军援卫，进入卫地。但见晋军势盛，楚军又退，遂杀掉公子买以讨好晋国。同时却告诉楚成王说：“公子买不能完成援卫的任务，而把他杀了。”

晋文公为了继续调动楚军，以解宋围，又南下进入曹国，围攻曹都陶丘(今山东定陶)。但遭到曹军的顽强抵抗，死伤很大，最后晋文公使用诈术④，乘曹军不备攻入陶丘，俘虏了曹共公。为了加深楚、宋两国的矛盾，便把曹共公交给宋国军队去看管。

从晋军的上述行动可以看出，晋军作战目标选定卫、曹，既是为了解救宋围，又是为的

调动楚军北上，相机打击之。如果晋军不是伐卫攻曹，而远道南下去进攻围宋的楚军，就会陷于被动；不能得到“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”（先到战场，以逸待劳）的好处，而要受到“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”（后到战场，以劳就逸）的害处。正如孙子所说：“故善战者，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《孙子·虚实论》。晋军的战略，正是这样。另外，此时晋军力量还不加楚军强大，如果以弱击强，过早追求决战，自然对晋不利。

晋文公这个伐卫攻曹，以解宋围的战略，在两百多年以后被战国时齐国的孙臧所发展，成为我国军事战略、战役的一个重要原则——“围魏救赵”②。它是调动敌人，解救围魏和避实击虚的有效战法。使敌人能为我所调动。而“不得不与我战者”，是“攻其所必救也”《孙子·虚实篇》。

此外，晋军借口伐曹而假道于卫，卫公不许，即回师自南河渡河，迅速占领卫地，乃是奇袭战法的运用；急攻曹都，一时未克，改用诈术而取得胜利等，都是春秋时代“正道”思想动摇后的产物，也是战法上的一个发展。

楚军方面，因伐宋围郑，陷入顿兵坚城，攻齐戍谷，更造成兵力分散，救卫不及，半途而归，失掉了盟国。这些不能不说是失策的。

也有人认为，此时楚王如能集中优势兵力，迅速进至曹、卫，乘晋军势孤之时，一举击败晋军，就可以稳定中原局势，维持中、小国家对楚国的依附。但楚王并没有这样做。而由于其作战指导上的错误，导致了初战的失利。

（二）“赂齐秦，分曹卫田”，争取齐秦参战

晋军虽然攻占了卫、曹两国，可是楚军还是围攻宋都商丘不放。所以，宋成公又派门尹般到晋营告急。

此时，齐昭公（潘）虽然在卫国的敛孟（今河南濮阳东南）已与晋文公会过盟，但还未决定出兵参战；秦国虽然和晋国友好，但仍抱观望态度；鲁国虽然杀了公子买，但暗中仍与楚国有连系。这就使得晋文公有些举棋不定：想单独去救宋而进击楚军，又顾虑自己的力量不如楚军强大；不去救宋，则又不能达到“报施救患，取威定霸”的目的。总之，没有齐、秦参战，是难以战胜强楚的。

晋文公于是召集卿大夫谋议，说：“宋人告急，舍之则绝（舍弃不救他一定与我绝交而投楚），告楚不许，我欲战矣，齐秦未可，若之何？”

中军元帅先轸提出一个“赂齐秦，分曹卫田”，以争取齐、秦参战的建议，说：“使宋舍我而赂齐秦，借之告楚（利用齐秦向楚国说情）。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，楚爱曹卫，必不许也。喜赂怒顽（齐秦两国欢喜宋国送给他的贿赂，怨恨楚国的顽固不讲情面），能无战乎（齐秦一定和楚国破裂而出兵参战）？”

先轸这个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，制造矛盾，利用矛盾的策略，得到了晋文公的称赞。并且一一按照实行了。果然楚成王拒绝了齐、秦两国的调停，而齐、秦两国因为得了宋国的贿赂，就出兵参战了。这时，晋国即由劣势转变为优势。

楚王看到晋军已攻占了曹、卫两国，并和齐、秦两个大国也建立了军事同盟，北方的鲁国也动摇不定，整个形势对楚不利。同时他又晓得晋文公长期流亡在外，饱经风险，通达人

情，有丰富的政治经验，是一个很难对付的敌手，于是就采取避战的方针，带着主力②从宋国前线撤回楚国到楚国的申地（今河南南阳），并令戍守齐地谷邑的申叔迅速撤离齐国，令留在宋国的统帅子玉“无从晋师”而撤离宋国。且告诉子玉，“军志曰：‘允当则归（适可而止）’。‘知难而退’。‘有德不可敌。’此三志者，晋之谓也。”但是楚军统帅子玉却不同意楚王这种决定，坚持要维持中原的霸业，不惜与晋军一战。他派大夫伯棼向楚王请战说：“王迁晋至厚，今知楚急曹、卫而故伐之，是轻王。”并且说：“非敢必有功也，愿以同执谗慝之口。”②

楚成王内心很矛盾，避战吧，就要丧失中原的霸权；决战吧，形势又很不利。所以最后只派西广、东宫、若敖六卒③去增援子玉。

晋文公“赂齐、秦，分曹卫田”，以争取齐秦参战的策略是十分巧妙的，他最大好处是自己不出面而达到了预定的目的。他利用曹、卫的田，利用宋国的财物，利用齐、秦与楚国的矛盾，利用楚国的拒绝调停，而使齐、秦不自觉地为晋国“取威定霸”而参战，这比自己出面要求齐、秦出兵参战好得多了。晋文公这个策略运用成功后，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对于战争全局也是有决定意义的。

楚成王本来也不是弱手。他过去对付过齐桓公，玩弄过宋襄公，可是对于晋文公的这一个策略，则未能识破，未能乘机运用策略以破坏齐、秦与晋的联合，争取齐、秦的中立，竟致贸然拒绝调停，遂使对方势力突然强大，而陷自己于劣势，这是非常失策的。

当中原形势已转化为对楚不利时，楚成王是采取集中兵力，坚决维持中原霸权而与晋军一战好呢？还是“知难而退”，放弃中原霸业而避免与晋军决战好呢？

我们认为，此时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对楚都很不利，失掉卫、曹，鲁国动摇，围宋不下，兵力分散，军队疲惫，而晋、齐、秦三大强国又联合起来，若坚持与晋决一雌雄，是没有战胜的把握的。况且齐、秦与晋的团结并不是很巩固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化是必然的。只要保存了实力，虽然暂时失去了一些盟国，造成暂时不利的局面，但以后仍可以待机北进，夺回霸权。由此可见楚王避战的方针是符合孙子所说的“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守之，不若则能避之”的原则。没有战胜的把握，暂时避免决战，是完全应该的。子玉则与此相反，当形势已变得对楚不利，作战已无胜利把握的时候，仍然盲目地追求决战，是一个“先战而后求胜”（不管能否取胜就先打仗）的方针，是军事上的冒险主义。尤其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，堵别人的嘴，固执地追求与晋军决战，这是非常错误的。

也有另外一种看法，认为“子玉是一个坚强的人物，他……北进的坚决，是可取的”④。楚成王在晋军进入卫、曹，与齐、秦联合之初，未与晋军较量，未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，就放弃了盟国，放弃了中原霸权，从争夺霸权这一战略意义上看，不能说避战撤军的方针是正确的。因为晋军能以得到卫、曹、鲁、宋就“适可而止”吗？能不“乘胜追击”而完全囊括中原的诸侯吗？因此说楚王避战的方针是不正确的。

但是，楚成王的决心是摇摆不定的，既不集中兵力与晋军决战，又未运用策略与晋国周旋，更未彻底退军以避免决战。当子玉请战时，又存着侥幸取胜的心理，留恋中原的霸权，虽派遣了军队，给又不给与足够形成优势的兵力。由于这一错误，就基本上失去优势的地位而转变为劣势了。

(三) “私复曹、卫，执宛春”，激楚求战

楚军统帅子玉，得到了楚王派来的援兵以后，更加坚定了与晋军决战的决心。为了张大楚军作战的理由，使晋军陷入理屈辞穷而得不到他国同情的条件下与之决战，遂派使者宛春到晋营，向晋文公提出一个“请复卫侯而封曹，臣亦释宋之围”的建议。

子玉这一“复卫封曹，楚亦释宋”的策略，使得晋文公十分尴尬，晋文公遂与卿大夫进行谋议。

狐偃建议说：“子玉无礼战，君取一（晋君只得到一个国家的好处），臣取二（子玉做臣子倒取得曹、卫两国的好处），不可失矣。”这就是说子玉违犯了君臣大“礼”，抓住这个理由，向楚军来进攻。

中军元帅先轸不同意狐偃提出的理由和办法，说：“定人之谓礼。楚一言而定三国，我一言而亡之，我则无礼，何以战乎？不许楚言，是弃宋也；救而弃之，谓诸侯何？楚有三施，我有三怨，怨仇已多，将何以战？不如私复曹、卫以携之（不如私下答应曹、卫复国，使其与楚国断绝关系），执宛春以怒楚，既战而后图之（使楚军来向我们求战，看情况我们再图谋他）”。

晋文公采纳了先轸这一建议，把楚使宛春扣在晋营，私下允许曹、卫两国复国，两国果然都和楚国断绝了国交。这样一来真的把子玉激怒了，马上指挥军队向曹都定陶前进，同时调动围谿的楚军，一同逼近晋军。

楚军统帅子玉和晋文公双方的策略斗争，至此进到最紧张的阶段了。子玉的“复曹、卫，释宋围”的策略，是在知道晋国形势已由劣变优的情况下提出的，如果晋文公拒绝，就使晋军陷于理屈辞穷，就会“楚有三施，晋有三怨”；如果接受子玉的条件，不但要弃曹、卫这一既得的胜利果实，达不到“取威定霸”的目的。而且三国都会感恩附楚，使得楚成王仍能在诸侯中享有盛名，这对于晋国是十分不利的。

狐偃的策略，只是从君臣大“礼”上找点理由而执行其“战”的方针，其理由是不充分的。因为这会招致三国的怨仇，将会失掉与国的帮助。

先轸的“分曹、卫之田”的策略是好的，“执宛春”的策略在道义上虽然有些站不住脚^⑦，但是对付子玉这个对手，还是成功了。先轸这个策略，居然能把晋国的政治、外交上的不利条件化为有利条件；不但争取了盟国，而且也拆散了楚国的盟国；不但在道义上站住了脚，而且也达到了激楚求战的目的；不但争取了主动，而且也变劣势为优势了。

《孙子·火攻篇》有一段说：“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；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”这才是“安国全军之道也。”楚军统帅子玉，在这个问题是没有掌握好的。

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里告诉我们说：“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。那时虽然敌处劣势，我处优势，然而仍遵照‘执行有利决战，避免不利决战’的原则，直打到鸭绿江边，都是如此。这样，我可始终立于主动，一切敌人的‘挑战书’旁人的‘激将法’，都应束之高阁，置之不理，丝毫不为其所动。抗日将军们有这样的坚定性，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。那些‘一触即跳’的人们，是不足以语此的。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498页）。

(四) “退避三舍”，后发制人

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晋军，为实践以前流亡在楚时对楚王的诺言，下令晋军向卫境退避三舍^⑳。可是有些将士不明白晋文公的意图，认为“以君避臣，辱也。且楚师老，何故退？”（君避臣是耻辱，况且楚军已疲劳为何退却）。

狐偃向大家解释说：“师直为壮，曲为老，岂在久乎？微楚之惠不及此，退三舍以避之，所以报也。背惠失言，以亢其仇，我曲楚直。其众素饱，不可谓老。我退而楚还，我将何求？若其不还，曲在彼矣。”将士听了这一番话，才明白“退避三舍”的道理，不再说什么了。

晋军按计划后退，四月初二退到了城濮（今山东范县东）。这时，齐国、秦国和宋国的军队也先后到达了城濮，晋军士气更加旺盛。

楚军将士看见晋军后退，都想停止不追。但子玉坚持不肯罢兵，命令楚军继续前进，逼近晋军，背靠着丘陵地带进行舍营。

晋文公的“退避三舍”从表面上是实践诺言报答楚惠的一种道义行为，而实际上则是博取同情，提高威信，更重要的是避开楚军锋芒，诱敌深入，后发制人的一种战略。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，不但使楚军陷于理屈气衰、士气不振的境地，而且还达到以下的目的：

1.推迟了决战的时间，以待齐、秦等国军队的到达，使能集中优势的决战兵力^㉑。

2.调动楚军深入于选定的战场，缩短了晋军的补给线；使楚军孤军深入，疲劳沮丧，后援困难。

3.激发了晋军的士气，争取了诸侯的同情，滋长了子玉的骄傲情绪。

总之，“退避三舍”，造成了晋军决战的有理、有利的条件，又一次争取了主动和转变了优势，最终获得全胜的战果。

(五) 先弱后强，各个击破（附图3）

晋军和齐、秦等国军队集中于城濮后，楚、陈、蔡联军也开到。看来晋、楚两大国的争霸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了。虽然总的形势已对晋军很有利，但是，晋文公仍在考虑这一决战的后果如何；因为楚国究竟是大国，楚军也是个劲敌。

狐偃建议说：“战也。战而捷，必得诸侯；若其不捷，表里山河^㉒，必无害也。”

晋文公还考虑说：“若楚惠何？”

栾枝说：“汉阳诸姬^㉓，楚实尽之。思小惠而忘大耻，不如战也。”

晋文公听到这些建议和解释，明确了这一决战若能打胜，就能夺得霸权，打败也无大害。并且打还可以号召姬姓和周封的国家，得到他们的拥护，不打会被认为是“思小惠而忘大耻”。所以，晋文公最后定下了与楚军决战的决心。

楚军统帅子玉，急于求战，到达城濮之后就派斗勃（子上）向晋文公请战，说：“请与君之士戏，君凭轼而观之，得臣（子玉）与寓目焉”。

晋文公还是很有礼的，使栾枝回复子玉说：“寡君闻命矣。楚军之惠，未之敢忘，为大

夫退，其敢当君乎？既不获命矣，敢烦大夫谓二三子，戒尔车乘，敬尔君事，诒朝相见。”

四月初四，晋军阵于城濮以南的莘北，楚军背鄢^②而阵。双方决战部署如下：

晋、齐、秦、宋联军：

上军在右，狐毛为主将，狐偃为佐将；

下军在左，栾枝为主将，胥臣为佐将；

中军居中央后，先轸为元帅，隙奏为佐将。

楚、陈、蔡联军：

右军：为陈、蔡等国军队，子上指挥之；

左军：为申、息地方军队，子西指挥之；

中军：在中央后，为西广、东宫、若敖六卒，子玉指挥之。

晋、齐、秦、宋联军拥有战车七百乘，士兵五万多人。晋文公在出战之前，还检阅一下军队，认为“少长有礼”（纪律严明），“其可用也”。楚、陈、蔡联军的兵力要比晋、齐、秦、宋联军少些，但子玉还认为“今日必无晋矣”。

决战开始，晋军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，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军的右军——陈、蔡军进攻。陈、蔡军战力很差，斗志不坚，遭到这一突然而奇异的进攻，都惊慌失措，弃阵逃跑，楚军的右军就这样的崩溃了。

晋军上军主将狐毛，故意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，引车后退，装做主将要退却的模样。同时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车拖着树枝，扬起地面尘土，假装后面的军队也在撤退。楚军左军不知是计，便开始进击，直冲晋军的上军。晋军的中军元帅先轸，佐军隙奏见楚军已被诱至，便指挥中军的精锐部队拦腰冲击，晋军上军也回军反扑。在晋军中军和上军夹击下，楚军的左军也大部被歼，一部溃退。

子玉看到右、左两军都已失败，急忙撤退中军，才得保全中军退出战场，收容左、右军的残部，退回楚地连谷。

这一会战，晋军一共俘获楚军战车一百乘，徒卒一千人。战后就地休整了三天，到了四月初八，才班师回国。

晋楚两国的争霸战争，以城濮决战晋胜楚败而告结束。晋文公君臣虽然早已有与楚军决战的打算，但对这场决战，却始终采取了审慎的态度，始终衡量着胜如何，败又如何，对盟国又如何等等问题，直至考虑成熟后才定下决战的决心。象晋文公君臣这样审慎的态度和多方的考虑，是值得很好研究的。

从晋军的作战行动中，看出晋军在作战指导上是先从楚军薄弱的两翼下手的，这是“避实击虚”的战法。

这种战法在《左传》中有过多次记载，最早的是在周桓王十三年（公元前707年）周郑繻葛之战，郑庄公（寢生）就是利用“陈乱，民莫有斗心，若先犯之（左军），必奔。王卒（中军）顾之，必乱；蔡、卫（右军）不枝，固将先奔；既而萃（集中）于王卒。”而大胜周军的。到了春秋末期（公元前500年左右），孙子就总结出打弱的规律，说：“兵之所加，如以碇击卵者，虚实是也。”《孙子·兵势篇》。这些战例和理论，是我国军事史中的宝贵遗产。

晋军对楚军薄弱的两翼，又是根据其强弱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战法。对楚军最薄弱的右

军——陈、蔡军，仅以一部兵力，采取出奇制胜，先发制人的战法；对于较弱的左军——申、息军，就采取退却而诱之，夹击致胜的战法。这种作战指导上的灵活运用，在当时以车战为主的年代，确是达到了很高的指挥艺术，比起长勺、濡葛之战时又有很大的发展。

楚军统帅子玉，在骄傲轻敌思想的支配下，急于求战，短于用智，盲目冒进，陷于被动。战前未察陈、蔡军的脆弱，予以防范；战中又不熟悉晋军的虚实，仍然冒险进攻。以致右军左军，一溃一歼；中军虽得退出战场，但终不能挽回决战的败局，而使中原的霸权，转入了晋文公的手中。

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中说：“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，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，一战而胜，再及其余，各个击破，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，转成了主动。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；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，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，完全丧失，化为败军之将，亡国之君。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，第二卷，480页）。这正好说明了晋楚胜败的原因。

（六）践土会盟，晋文建霸

城濮战后，晋文公在践土（今河南郑州市西北荣泽）召集诸侯会盟，原来楚所控制的盟国，都转到晋国方面来了。晋文公向周襄王献上楚国的俘虏和兵车，并对各诸侯说：“大家要同心协力辅佐王室，不要互相侵害”。

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（诸侯之长），晋文公的霸业即正式确定了。战败回国的楚军统帅子玉，受到了楚成王的责难，他不想逃避失败的责任，终于自杀了。

简 评

城濮之战，是春秋时期楚晋长期争霸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争，就交战双方来说，无论所占土地的大小、盟国（附属国）的多少和军力的强弱，楚国都超过了新兴的晋国而居于优势地位。然而战争的结局却是晋胜楚败，其主要原因，归纳起来有：

从晋国方面来说，首先是由于在国内整顿内政，发展生产，教育人民，增强军队，对战争有足够的准备，因而在国力上奠定了巩固的基础。

其次是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，使劣势转化为优势，被动转化主动。在政治上，以“尊王攘夷”相号召，处处争取中原（姬姓、周封）诸侯的政治同情；在外交方面，始终坚持争取与国，孤立敌人的方针。利用楚国和齐、秦的矛盾，争取了齐、秦两大国的合作，改变了孤立无援的不利地位。同时，还注意加强内部团结倾听有益意见，瓦解敌人同盟者的工作。这样，就团结了可能团结的一切力量，孤立了敌人，改变了原来的不利形势。这些策略的运用，在整个战争中是有着决定意义的。

在战略指导方面，根据敌、友、我的情况，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，如：加兵卫、曹以调动楚军，私复卫、曹二国，执宛春以激怒楚军，退三舍以深诱楚军等。不但达到了激楚求战的目的，而且也始终处于有理、有利的主动的地位，这也是以弱胜强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孔子批评晋文公“谄（诡诈）而不正”，是说他好用“诡道”的缘故。我们说，对敌斗争是兵不厌诈的，“我们不是宋襄公，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。”我们要“争取自己的胜利。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482页）。清代历史学家魏源评论城濮之战，说晋文公“能用盟国，能用敌国，又能用敌国之盟国以困敌，其绳索之收放，皆在我而不在人。满则满矣，然而不可谓妙”。并且不得不承认斗争的确是一种“制胜之道。”

在城濮决战时，晋国君臣在作战指导上的灵活机动，避实击虚，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反观楚国君臣的战争指导错误很多，首先在外交上，不能识破晋文公的斗争策略，来作出相应的对策，以保持主动和优势，孤立晋国，维持霸业。所以当齐、秦出兵参战及盟国背离以后，整个中原形势就变得对楚更加不利了。

其次在战略指导上，楚王与子玉的战略思想不一致，楚王意在退守，子玉不惜一战。当形势对楚不利之时，楚王虽作出避战的决定，但还留恋中原的霸权，存着侥幸取胜的心理，既不彻底避战，又不集中兵力与晋决战，这就使楚军丧失了优势的有利条件。而子玉骄傲轻敌，孤军冒进，这样一败涂地的命运，更是不能避免的了。

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里说：“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，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，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、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。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，中国如晋楚城濮……，都是以少击众，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。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，480页）这正是需要我们更好地研究城濮之战的重要原因。

注 释

①孔子写过一本著名的历史书叫《春秋》。这本书的编年和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的起止时间差不多，故历史上就把这一时期叫做春秋时期。

②春秋时期作战以战车为主，每个战车由四马驾引，车上甲士三人，车下甲士七人，车的左、右、后有徒步兵15—125人跟随。

③国人：西周、春秋时，对居住于国都的人的通称。春秋时国人有参加议论国事的权利，同时也有服军役和军赋的义务，各国军队每以国人作为主力部队。

④野人：古代对居于国都外的农业生产者的称谓。

⑤〔国语·晋语〕载宋人弑昭公，赵宣子请师于灵公以伐宋，公许之，乃发令于太庙，召军吏而戒乐正，令三军之钟鼓必备。赵同疑之。宣子曰：“……伐备钟鼓，声其罪也；战之鐃于（乐器）丁宁（钲），傲其民也；袭便密声，为楚（皙）事也。……明声之犹恐其不闻也。”

⑥〔司马法·仁本〕：“成列而鼓，是以明其信也。”

⑦〔司马法·仁本〕：“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，是以明其仁也”。

⑧〔司马法·仁本〕：“逐奔不过百步，纵绥不过三舍，是以明其礼也。”

⑨〔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〕：宋襄公与强大的楚军作战，坚持“正道”而被打败。国人都责备他，他还坚持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”。

⑩〔孙子、计篇〕。

⑪**辕田**：是当时为封建制度开辟道路的一种社会改革，即赏众人以田，使农民固定使用他原来耕种的那块田地，取消过去农村公社调换土地的方式。

⑫**州兵**：五党为州，州二十五百家，是国都以外的邑落。晋国的大臣们，为了加强晋国的军事力量，把武器交到各州的人民手中，使各州缮治甲兵，开始建立起地方部队。

⑬**晋文公回国即位后**，即开始教育人民。利用“出定襄王”，教育人民以君臣义，利用进攻原（在今河南济源西北）时计划三日，到第三日未攻时即自动撤兵，教育人民以守信；训练军队，整饬官纪，教育军队和官吏以组织纪律。

⑭**秦晋的婚姻关系**：秦穆公的夫人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，晋文公的夫人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。晋与戎狄的婚姻关系：晋文公的母亲狐姬是犬戎的女儿，晋文公出亡在狄时，娶赤狄的女儿季隗为夫人。

⑮**齐、楚的矛盾**：在齐桓公称霸中原时，阻止了楚人的向北扩张，齐桓公死后，齐国霸业衰微，中原的霸权被楚成王夺去，楚国支持和怂恿鲁、卫等国，不断对齐战争，以压制齐国。

⑯《史记·晋世家第九》。

⑰**楚国在武王时**，早具三军，至楚成王时，约有3—4军；郑与鲁原是大国，各有三军，但此时郑、鲁均已衰落，约有2—3军；宋有2军；陈、蔡、曹约有1—2军；许、卫约有1军；合计约有17个军兵力。

⑱**报施**：晋文公在外流亡过宋的时候，曾受到宋襄公的招待和赠送马匹。本项引文，均摘自《左传》。

⑲**报楚惠**：晋文公流亡到楚国时，楚成王以国君的礼节招待晋文公。并派军队把晋文公送到秦国，支持他回国取得君位。从道义上说，受人之惠后，必有以报之。

⑳**曹共公对晋文公无礼**：晋文公流亡到曹国时，曹共公听说晋文公身躯两侧，自腋下至肋骨尽处相连，在晋文公沐浴的时候，逼近着他。晋文公认为这是无礼。

㉑**晋文公使用诈术攻入陶丘**：晋军围攻曹都，曹军猛烈抵抗，晋军伤亡很大。曹军把晋军的尸体陈列在城墙上，使晋军士气沮丧。晋文公听群众的建议，扬言把军队驻扎在曹人的墓地上，发掘坟墓。曹人看见，非常恐惧，连忙把晋军的尸体用棺木收敛好送出城来，企图感动晋军，不去掘他们祖先的坟墓。晋军就来这个机会，攻入曹都。

㉒**围魏救赵**：周显王十六年（公元前353年），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。齐王命田忌、孙臆救赵，孙臆认为魏国的精锐部队在赵，内部空虚，乃引兵攻魏，魏军回救本国，齐军乘其疲惫，在桂陵（今山东菏泽东北）一战，大破魏军，赵国之围遂解。以后中国的军事家就引用“围魏救赵”来说明一切类似的战法。

㉓**楚成王从宋国带走的军队**有正军1——中军及申叔指挥的部队；亲军1——东广；盟国军队——郑1——2军，许1军。留给子玉的部队有正军1——申息军；亲军1——西广；官兵1——东宫；族兵1——若敖六卒；盟国军队——陈、蔡各1军。楚成王共带走有5个军，留给子玉指挥的有4个军。

㉔**当子玉被任命为令尹时**，蒯贾批评子玉“刚而无礼，不能指挥作战，所统率的军队如果超过三百乘，必会丧师辱国”。子玉企图打一个胜仗，以杜塞“小人”的咀，这也